



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5 (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耶·德许特根
据人权理事会第 44/13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6/150。



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耶·德许特的报告

贫困的持续存在：真正的平等如何才能打破恶性循环

摘要

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耶·德许特在本报告中指出，出生在处于劣势的家庭的儿童被剥夺了平等机会：仅仅因为父母贫困，他们成年后达到体面生活水平的机会就大大降低。

特别报告员考察了在卫生、住房、教育和就业领域导致贫困固化的途径。不平等现象的增多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成因：社会越不平等，就越不允许社会流动，而财富不平等在这方面尤其具有破坏性。

结束贫困的恶性循环是可以实现的。若要打破导致贫困固化的循环，关键在于对幼儿教育和保育的投资、全纳教育、为年轻人提供普遍基本收入、增加遗产税以及禁止基于社会经济劣势的歧视。在仍然被财富深度隔离的社会中，贫困人口面临系统性歧视：这要求采取系统性的补救措施，消除沿袭的割裂现象。

一. 引言

1. 机会均等是我们理解的公正社会的核心。这一理想基于一个简单的信念：没有一名儿童应该因出身贫困而受到惩罚。然而，这在今天还远远没有成为现实。出身贫困的儿童在成年后仍然贫困的机会要大得多，因为多种机制可以导致贫穷代代相传。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如果儿童来自收入底层十分之一的家庭，则大约需要四到五代人的时间才能达到平均收入水平。在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儿童中，约有 63% 达到高等教育水平，而在父母未完成中学教育的儿童中，这一比例仅为 15%；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儿童中，7% 只受过初等教育，而在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儿童中，只受过初等教育的比例为 42%。父母富有的儿童在成年后患慢性健康疾病的几率也要低 13%。¹

2. 在全球范围内，教育水平处于顶层的 25% 的人口的特权和底层的 50% 的人口的贫困代代相传，远比向上或向下的流动更为普遍。² 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出生于 1940 年代的人从底层 50% 升至顶层的 25% 的机会高于发达国家，但现在情况发生了逆转：发展中国家的向上流动性现在正在下降，而持续留在底层的情况正在增加。³ 相对流动性低意味着特权和贫困都更有可能代代相传，这对贫困者有明显的影 响。

3. 本报告将机会平等的理想与贫困固化的现实作了对比。一旦我们了解了导致贫困固化的机制，机会均等似乎是一个激进的想法：它需要改变低收入家庭出生的儿童所面临的条件，并且要从很小的年龄开始，为此要投资于幼儿保育和教育，因为尽早采取干预措施可能对于克服劣势最为有效。⁴ 儿童贫困的持续存在不仅是对人权的侵犯，还危及未来，因此，不作为的社会代价是巨大的。在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一个国家，假若考虑到经济生产力的损失、医疗保健成本和犯罪成本的增加以及儿童无家可归和受到虐待的后果，儿童贫困每年造成的损失超过 1 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4%。另一方面，投资于儿童有相当大的回报：在减少儿童贫困上每花 1 美元，就能省下 7 美元。⁵

4. 本报告是基于对贫困固化问题已有证据的系统审查，以及生活贫困或有贫困经历的人提供的信息。特别报告员感到感激的是：他能够召开两次为期两天的专家会议，其中一次会议由卢森堡社会经济研究所提供协助并得到卢森堡的支持，另一次会议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代表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和发展部提供协助；他可以与生活在欧洲(比利时和卢森堡)、拉丁美洲(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危地马拉、墨

¹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断裂的社会阶层上升通道？如何促进社会流动性”(2018 年，巴黎)，第 14 页。

² 世界银行，“公平进展？全球代际之间的经济流动性”(2018 年，华盛顿特区)，第 125 页。

³ 同上，第 13 页。

⁴ James J. Heckman, “The economics, technology and neuroscience of human capability formation”,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第 104 卷，第 33 期(2007 年 8 月)，第 13250-13255 页。

⁵ Michael McLaughlin 和 Mark R Rank, “Estimating the Economic Cost of Childhoo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社会工作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2018 年 6 月)，第 73-83 页。

西哥、秘鲁)和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贫困者进行到场和虚拟的参与式对话。这些参与式对话产生的证言对于提出本报告探讨的问题和确定相关建议至关重要。特别报告员感谢所有筹备和参加这些对话的人。他们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是在世界各地消除贫困的重要知识来源。

二. 导致贫困固化的因素

5. 与富裕家庭出生的儿童相比，出生在劣势家庭的儿童在成年后达到适当生活水平的水准的机会要少得多。难以获得医疗保健和接触风险因素会导致健康状况不佳。健康状况不佳不仅在医疗保险不足或无法获得的地方代价高昂；还会降低就业机会。生活在低于标准的环境中或公共服务不足的地方，也可能对摆脱贫困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获得优质教育也往往更加困难，教育成就受到幼儿期面临的环境的严重阻碍。由于与儿童时期的社会经济劣势有关的原因，就业前景也较为黯淡。

6. 也许比导致贫困固化的各种恶性循环更引人注目的是，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都是人们仍然深陷贫困的主要原因。由于保存、获取或继承资产的机会较少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的覆盖率较低，贫困者很少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轨迹。较富裕的家庭能够以其积累的财富和收入、社交网络和更高的教育水平(他们凭此获得收入更高的工作)应对外部和内部冲击，而较贫穷的个人缓解风险和冲击的选择较少。

A. 医疗保健

7. 更平等的社会拥有更健康的民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收入更加平等与健康状况改善(用预期寿命或婴儿死亡率等指标衡量)之间存在关联。⁶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医疗保健成果、包括预期寿命因不平等的加剧而严重恶化，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能弥补这一点。⁷ 来自这些区域的证据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更好的健康状况；如何重新分配这种增长的结果则重要得多。

8. 贫困和健康状况不佳是相互关联的。处于劣势的群体暴露在环境危害和极端温度下，并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面临经济障碍。童年时期有过贫困经历的成年人

⁶ Kate E. Pickett 和 Richard. G. Wilkinson, “Income inequality and health: A causal review”, 《社会科学和医学》, 第 128 卷(2015 年 3 月), 第 316-326 页; Salvatore J. Babones,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pulation health: correlation and causality”, 《社会科学和医学》, 第 66 卷, 第 7 期(2008 年 4 月), 第 1614-1626 页。

⁷ Ibrahim Abidemi Odusanya 和 Anthony Enisan Akinlo,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pulation health in sub-Saharan Africa: a test of income inequality-health hypothesis”, 《人口与社会研究期刊》, 第 29 卷(2021 年 1 月), 第 235-254 页; B. Biggs 等人, “Is wealthier always healthier? The impact of national income level, inequality, and poverty on public health in Latin America”, 《社会科学和医学》, 第 71 卷, 第 2 期(2010 年 7 月), 第 266-273 页。

患高血压或慢性炎症的风险更高。⁸ 此外，贫困对儿童的成长发育带来冲击，这既影响个人的长期健康前景，也影响个人的经济前景。生活在匮乏中的压力会导致生理反应——各种压力荷尔蒙(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促皮质激素释放激素、皮质醇、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水平升高。虽然这是一种自然的身体反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护作用，但如果长期处于高水平，可能会损害大脑。⁹ 这还会损害前额叶皮质的功能，从而损害学习、行为调节和人际关系。¹⁰ 美国儿科学会的一个委员会总结了这一证据，指出“贫困和决定健康的其他社会因素对关系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尤其是缺乏成年抚育者的情感支持，增加了产生儿童毒性压力的风险，以及在情绪调节、儿童早期发育以及最终实现终身健康方面的困难”。¹¹

9. 其他研究证实了贫困和家庭压力之间的联系，这造成了儿童的不利处境，当贫穷开始得早、程度深或持续时间长时，这些不利处境又会引发毒性压力、不良的儿童健康状况和社会后果。¹² 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的预期寿命比中等收入者低 10.5 岁。¹³ 相比之下，最富有的 1% 的妇女和男子的平均寿命分别比最贫穷的 1% 的妇女和男子长 10.1 岁和 14.6 岁。在过去 15 年，最富有的 5% 的人的预期寿命增长速度是最贫穷的 5% 的人的两倍。¹⁴

10. 在欧盟各家，有高中以下学历的 30 岁男子的平均预期寿命比有大学学历的男子低 8 年左右。¹⁵ 在英格兰，2018 年，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预期寿命差异分

⁸ Gregory E. Miller, Edith Chen 和 Karen J. Parker, “Psychological stress in childhood and susceptibility to the chronic diseases of aging: moving toward a model of behavioral and biological mechanisms”, 《心理学公报》, 第 137 卷, 第 6 期(2011 年 11 月), 第 959-997 页。

⁹ Rebecca Reynolds, “Glucocorticoid excess and the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disease: two decades of testing the hypothesis”, 《神经心理内分泌学》, 第 38 卷, 第 1 期(2013 年 1 月), 第 1-11 页; Cristina Barboza Solís 等人,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physiological wear-and-tear in midlife: findings from the 1958 British birth cohort”, 《美利坚合众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第 112 卷, 第 7 期(2015 年 2 月), 第 E738-E746 页。

¹⁰ Jamie L. Hanson 等人, “Family poverty affects the rate of human infant brain growth”, 《公共科学图书馆: 综合》, 第 8 卷, 第 12 期(2013 年 12 月), 第 e80954 页。

¹¹ John M. Pascoe 等人, “Mediators and adverse effects of chil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儿科》, 第 137 卷, 第 4 期(2016 年 4 月)。

¹² 美利坚合众国, 加州卫生局局长办公室, “Roadmap for Resilience: The California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on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Toxic Stress, and Health” (2020 年, 加州萨克拉门托), 第 136 页。

¹³ Gopal K. Singh 和 Hyunjung Lee, “Marked disparities in life expectancy by education, poverty level, occupation and housing ten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7-2014”, 《国际妇幼健康和艾滋病期刊》, 第 10 卷, 第 1 期(2021 年), 第 7-18 页。

¹⁴ Raj Chetty 等人,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2014”, 《美国医学会杂志》, 第 315 卷, 第 16 期(2016 年 4 月), 第 1750-1766 页。

¹⁵ 经合组织和欧洲联盟, “健康概览: 2018 年欧洲” (2018 年, 巴黎), 第 84-85 页。

别为男性 9.3 岁，女性 7.3 岁。¹⁶ 2003 至 2018 年间，三分之一的过早死亡可归因于邻里社区贫困：如果每个人的死亡风险都与高收入阶层相同，那么将近 90 万例过早死亡本可以避免。¹⁷

11. 反之，糟糕的健康状况会导致贫困，这既是因为劳动者的生产力降低，也是因为寻求医疗保健的成本。至少一半的世界人口得不到所需的医疗保健。2010 年，估计有 8.08 亿人将其家庭总消费或收入的 10% 以上用于支付自付医疗费用，每年有近 1 亿人(其中 97% 在非洲和亚洲)因自付医疗费用而陷入极端贫困。¹⁸ 在 2014-2015 年度，近一半的非洲人没有寻求所需的医疗保健，十分之四的寻求医疗保健的非洲人在获得这种医疗保健方面遇到了困难。¹⁹

12. 除了直接财务障碍，如用户付费，某些国家医疗保健的机会不足的原因是担心歧视或污名化、缺乏教育和交通以及腐败：²⁰ 在非洲大陆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人中，七分之一(14%)曾通过行贿获得这些服务。²¹ 事实上，在为编写本报告而进行的情况咨询中，许多参与者认为医疗保健系统中的腐败是存在排斥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非正式付款或贿赂不仅导致高额的自付医疗支出，还侵蚀了公众对医疗保健系统的信任，并导致服务利用率下降。²² 据估计，在 7 万亿美元的世界医疗保健支出中，有 10%-25% 被贪墨，这超过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确保到 2030 年全球实现全民医疗保健方面每年填补资金缺口所需的数额。²³

B. 住房

13. 如果出身于社会经济方面处于劣势的家庭，儿童通常更有可能在过度拥挤、保温性能差的住房中长大，周边环境可能遭受污染而且不安全。这些儿童也更有可能生活在“贫民窟化”、充满暴力和无法充分获得基本服务的社区。当然，这种生活条件会影响健康，这既是因为住房条件本身，包括暴露在高度空气污染中，

¹⁶ 英格兰公共卫生，“Chapter 5: inequalities in health”，见于《英格兰健康概况：2018 年》(2018 年)。

¹⁷ Dan Lewer 等人，“Premature mortality attributable to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in England between 2003 and 2018: an observational study”，《柳叶刀公共卫生》，第 5 卷，第 1 期(2020 年 1 月)，第 e33-41 页。

¹⁸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追踪全民健康覆盖：2017 年全球监测报告》(2017 年，日内瓦)，第 24 页。

¹⁹ 非洲晴雨表，36 个非洲国家的第六轮调查结果要点(2017 年)，第 7 页。

²⁰ Amber Hsiao, Verena Vogt 和 Wilm Quentin, “Effect of corruption on perceived difficulties in healthcare access in sub-Saharan Africa”，《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第 14 卷，第 11 期(2019 年 8 月)，第 e0224915 页。

²¹ 非洲晴雨表，第 7 页(见脚注 19)。

²² Nahitun Naher 等人，“The influence of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delivery of frontline healthcare services in the public sector: a scoping review of curr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BMC 公共卫生》，第 20 卷，第 880 期(2020 年 6 月)。

²³ Patricia J. García, “Corruption in global health: the open secret”，《柳叶刀》，第 394 卷，第 10214 期(2019 年 11 月)，第 2119-2124 页。

特别是无法获得清洁能源或监管不足的地方，²⁴ 也是因为恶劣的食品环境和进入绿色区域进行体育锻炼和休闲的机会有限。²⁵ 进入绿色空间的机会有限可能会导致所谓的“自然缺失障碍症”，²⁶ 这可能会转化为注意力不足多动障碍症，使学习能力降低。²⁷

14. 这样的生活条件通常也会影响社会关系和人生机会。²⁸ 住在过度拥挤的住房里会导致睡眠障碍、更加紧张的家庭关系、压力和焦虑，从而影响儿童的教育。²⁹ 贫困和隔离的社区意味着儿童的社会联系将会减少。这些社区通常也缺乏高质量的学校、体面的工作机会和适当的医疗保健服务。换句话说，除了对适当住房权本身的影响外，基于财富的居住隔离还会减少机会均等。³⁰

C. 教育

1. 初等和中等教育

15. 生活在贫困中的成年人往往无法确保他们的孩子有比他们更好的成长机会，尽管他们尽了最大努力。许多家长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学，甚至完成大学教育。³¹ 然而，在处于劣势的家庭长大对受教育机会和教育成就有重大影响。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应可弥补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之间的不平等。恰恰相反，在特别报告员为编写本报告而组织的对话中，参与者一再表示，学校充其量是这种等级制度的翻版，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了这种等级制度。有四个具体机制正在发挥作用。

²⁴ Lucy Scott, “Chronic pov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a vulnerability perspective”,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第 62 号工作文件(2006 年 8 月, 伦敦)。

²⁵ Ichiro Kawachi 和 Lisa F. Berkman 编著,《社区和健康》(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纽约)。

²⁶ Richard Louv,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Nature-Deficit Disorder”(伦敦, 大西洋图书出版社, 2009 年)。

²⁷ Miles Richardson 和 Jenny Hallam,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rewards of a familiar semi-rural landscape: connecting to local nature through a mindful approach”,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 第 41 卷, 第 1 期(2013 年 2 月), 第 35-53 页; Elmira Amoly 等人, “Green and blue spaces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in Barcelona schoolchildren: the BREATHE project”, 《环境健康展望》, 第 122 卷, 第 12 期(2014 年), 第 1-34 页。

²⁸ Maarten van Ham 等人,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neighbourhood poverty: an analysis of neighbourhood histories of individuals”, 《英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 第 39 卷, 第 3 期(2014 年), 第 402-417 页。

²⁹ Liam Reynolds 和 Nicola Robinson, “Full house? How Overcrowded Housing Affects Families”(Shelter 出版社, 2005 年)。

³⁰ 适当住房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将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交关于这一专题的报告。

³¹ 世界银行, “学习兑现教育承诺”(2018 年, 华盛顿特区), 第 117 页。

16. 首先，来自劣势背景的儿童在获得优质教育方面可能面临障碍。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小学、初中和高中入学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教育程度。³²

17. 官方说法是，教育几乎是普遍免费提供的。然而，与学习用品和学习材料以及交通有关的额外费用仍然阻碍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上学。相比之下，高收入家庭不仅可以把钱花在学费上，还可以花在额外支出上，包括电脑、高质量的儿童保育、夏令营、私立学校和其他提高孩子能力的项目或体验。例如，在美国，197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额外学校支出增加了一倍多，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支出几乎保持不变，并在2000年代中期下降了7倍。³³有效和可负担的课外活动机会同样至关重要。虽然处于劣势的儿童从这类活动的受益可能多于家境更好的同龄人，但来自处于劣势的家庭的儿童实际上参与更少：³⁴平均而言，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被剥夺休闲活动的可能性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儿童的两倍多。³⁵

18. 因此，加大教育投资对于打破贫困循环至关重要。事实上，对教育的公共投资和流动性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特别是对发展中经济体和在初等教育方面。³⁶

《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设定了两个公共教育支出基准——教育支出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至少4%，占公共支出总额的至少15%。然而，就这两项指标而言，2000至2017年全球教育支出趋势基本持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个例外：该区域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0年的3.9%上升到2017年的5.6%（与其他区域相比，这是一个较高的比例），在全球范围内，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权比例在4.7%左右波动，而支出占公共支出总额的加权比例仅从2000年的12%上升到2017年的12.5%。³⁷在经合组织国家，教育机构的总支出没有跟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³⁸

19. 其次，贫困家庭的儿童也因其出身而在学校面临排斥。例如，在欧洲经合组织国家，每10名儿童中就有1名缺乏基本衣物，³⁹这可能导致这些儿童在学校面临歧视，或被同龄人和学校工作人员排斥或欺凌。比利时的一项教育方面的参

³² 世界银行，“公平进展？”，第120页（见脚注2）。

³³ Greg J. Duncan 和 Richard J. Murnane 编著，“Introduction”，in *Whither Opportunity?: Rising Inequality, Schools, and Children's Life Chances*（罗素塞奇基金会，2011年，纽约）。

³⁴ 欧盟委员会就业、社会事务和包容总司，“儿童课外活动的益处：关注社会包容和处于劣势的儿童”，研究纪要，2021年6月。

³⁵ 经合组织，“改变弱势儿童的命运：创造机会和复原力”（2019年，巴黎）。

³⁶ 世界银行，“公平进展？”，第27页（见脚注2）；Miles Corak，“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经济展望杂志》，第27卷，第3期（2013年6月），第79-102页，第86页。

³⁷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2020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包容与教育——说所有人，就是所有人》（2020年，巴黎），第321-323页。

³⁸ 经合组织，教育概览（2020年，巴黎）。

³⁹ 经合组织，“改变可能性”，第61页（见脚注35）。

与性行动研究项目发现, 贫困儿童所经历的耻辱是成功接受教育的关键障碍之一。⁴⁰ 在为编写本报告而与贫困家庭进行的情况咨询中, 对贫困儿童的污名化、贴标签和负面假设也被认为是相关因素。

20. 第三, 在认知能力和社会行为方面, 来自较高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往往为接受正规教育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在贫困家庭的儿童表现出学习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甚至在他们入学之前, 这些不足往往已经出现了。因此, 在几乎所有国家, 学生的家庭背景(父母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条件)仍然是预测学习成果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例如在法国, 在国际学生评估方案的测试中, 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学生在科学能力方面的成绩差异达到 115 分, 相当于大约三年的教育。⁴¹

21. 虽然对学习成绩的评估往往对社会经济出身低的儿童不公正,⁴² 但随着儿童的成长, 来自富裕家庭和贫穷家庭的儿童之间的教育成果差距保持不变。⁴³ 这种不公平差距背后的一个原因是, 在校学习的时间给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带来的好处少于富裕家庭的同龄人,⁴⁴ 而教学质量低又使这一现象更加严重。在全球范围内, 1.25 亿儿童在上学四年后没有掌握读写或算术能力, 其中贫困儿童的欠缺最为严重。⁴⁵ 在七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学生每天上课时间不到三个小时, 即只是排课时间的一半, 而且大部分教师没有在其所教的课程方面获得适当培训。⁴⁶

22. 事实上, 教育质量, 或者说被认定的教育质量, 也会使儿童和家长对接受正规教育感到灰心。在权衡送儿童上学还是让孩子打工两者之间的利弊时, 认为上学是浪费时间和/或金钱的这种观点是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到贫穷父母面临的限制, 以及当儿童可以工作养家时的高昂机会成本, 认为教育质量低的贫穷父母可能不太愿意让孩子继续就学。⁴⁷ 尽管童工人数在 2000 至 2016 年间减少 9 400 万人, 但此后一直在上升, 2020 年达到 1.6 亿人, 而且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 童工人数急剧增加。⁴⁸ 虽然大约三分之二的童工同时在学校注册, 但他们更有可能提前放学, 考试成绩不佳。⁴⁹

⁴⁰ ATD Quart Monde, *Nos ambitions pour l'école* (2017 年, 布鲁塞尔), 第 12 页。

⁴¹ 世界银行, “学习兑现教育承诺”, 第 78 页(见脚注 31)。

⁴² 教科文组织, “2020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 第 221 页(见脚注 37)。

⁴³ John Ermisch、Markus Jäntti 和 Timothy M.Smeding 编著, “From Parents to Childre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dvantage”(纽约, 罗素塞奇基金会, 2012 年), 第 465 页, 第 468 页。

⁴⁴ 经合组织, “同舟共济: 为什么减少不平等使所有人受益”(2015 年, 巴黎), 第 27 页。

⁴⁵ 世界银行, 《2018 年世界发展报告: 学习兑现教育承诺》(2018 年, 华盛顿特区), 第 78 页。

⁴⁶ Tessa Bold 等人, “What do teachers know and do? Does it matter? Evidence from primary schools in Africa”, 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 7956 号(世界银行, 2017 年, 华盛顿特区)。

⁴⁷ 世界银行, “学习兑现教育承诺”, 第 8 页(见脚注 31)。

⁴⁸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 《童工: 2020 年全球估计数、趋势和前进方向》(日内瓦, 劳工组织; 纽约, 儿基会, 2021 年), 第 8 页。

⁴⁹ 经合组织, “童工: 原因、后果和应对政策”(2019 年, 巴黎), 第 8 页。

23. 最后，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儿童可能从教育中获得的收益有重大影响：在法国、日本、大韩民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等国，即使在学历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属于低教育程度群体的父母的后代在收入上比属于高教育程度群体的父母的后代低 20%。⁵⁰ 这可能会强烈抑制对教育的投资：如果在职场得不到回报，为什么还要努力在学校表现优异呢？

24. 儿童的教育成就取决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而顶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正在扩大。一项对 100 个国家和大约 580 万学生进行分析的研究发现，1964 至 2015 年期间，这一差距扩大了，其依据是父母职业(差距增加了 55%)、父母教育程度(50%)以及家庭藏书(40%)：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资本(藏书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标)发挥着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收入分配的中层和下层之间的差距比中层和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特别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学习机会减少了。⁵¹

2. 幼儿保育和教育

25. 由于幼儿期的不利因素对以后的生活有重大影响，改善幼儿保育和教育对于打破贫困循环至关重要。事实上，虽然家庭的贫困压力可能会对儿童产生严重影响，包括对儿童的大脑发育产生严重影响，但这些影响并非不可避免，而且是可逆转的：为父母参与和关系健康提供支持的方案可以有效地缓解贫困的长期压力。⁵² 幼儿时期的育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不应该受到社会经济劣势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应该优先考虑为父母提供支持的原因。

26. 事实上，给孩子读书并与他们交谈是他们获得语言技能的主要决定因素，⁵³ 也是刺激儿童发展的关键来源。⁵⁴ 然而，与贫困相关的担忧消耗了脑力资源，因此儿童没有很多时间做其他事情，例如进行有意义的互动⁵⁵。在富裕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用丰富的语言互动更为常见，而在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单亲家庭，由于父母面临时间限制、低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存在与经济不安全相关的压力等因素，父母参与此类互动的机会往往会减少。⁵⁶ 例如，在巴拉圭，最

⁵⁰ John Jerrim 和 Lindsey Macmillan, “Income inequality,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Great Gatsby curve: is education the key?”, 《社会力量》, 第 94 卷, 第 2 期(2015 年 12 月), 第 505-533 页。

⁵¹ Anna K. Chmielewski, “The global increase in the socioeconomic achievement gap, 1964 to 2015”, 《美国社会学评论》第 84 卷, 第 3 期(2019 年 6 月), 第 517-544 页。

⁵² Kandyce Larson 等人, “Cognitive ability at kindergarten entr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儿科》, 第 135 卷, 第 2 期(2015 年 2 月)。

⁵³ Meredith L. Rowe, “Understanding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in parents’ speech to children”, 《儿童发展动态》, 第 12 卷, 第 2 期(2017 年 11 月), 第 122-127 页。

⁵⁴ James J. Heckman, “Skill 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children”, 《科学》, 第 312 卷, 第 5782 期(2006 年 6 月), 第 1900-1902 页。

⁵⁵ Anandi Mani 等人,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 《科学》, 第 341 卷, 第 6149 期(2013 年 8 月), 第 976-980 页。

⁵⁶ 经合组织, “改变命运”(见脚注 35)。

富有的 20%家庭的儿童中有 90%受益于可激发兴趣的成人参与,但最贫穷的 20%家庭的儿童中只有 40%受益。⁵⁷ 在美国,职业人员家庭的儿童比贫困家庭的儿童说的话多一倍以上。⁵⁸ 这些儿童还受益于更多的成长经历:在出生到 6 岁之间,美国低收入儿童在新奇地方花费的时间比高收入儿童少近 1 300 个小时,在读写活动上花费的时间比高收入儿童少 400 个小时。⁵⁹

27. 与后来人生的补救措施相比,幼年期间的干预措施在缩小处于劣势的儿童与其富裕同龄人之间的差距方面特别有效。一项研究发现,在 3 岁之前进行干预才能长期提高儿童的智商。⁶⁰ 在这一数据的基础上,拉丁美洲情况咨询的参与者呼吁向贫困家庭提供这种早期干预措施,以便使幼儿在父母工作时得到照料。可负担、便利的儿童保育设施也大幅改善了妇女的就业前景,从而提高了家庭生活水准并进而提高投资于教育的能力。

3. 就业

28. 从事提供维生工资的体面工作,可以让劳动者养活自己和家人,这通常是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然而,即使人口中有必要的学位和技能,就业机会也可能不足。⁶¹ 如果人们认为学校教育不能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这可能是挫折感的一个重要来源,甚至可能最终导致在获得资格证书方面投资不足。此外,即使劳动力市场的普遍改善也可能不会使面临社会经济劣势的人像其他部分人口那样受益:一些估计显示,人与人之间终生收入的差异至少有 50%是因为 18 岁前决定的特质,⁶² 而其中大多数特质实际上在 5 岁时就已经存在。⁶³

29. 首先,并不是所有工作都是体面工作。由于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学历往往较低,因此即使在正式或非正式就业的情况下,他们也更有可能继续处于贫困状态。低收入国家的大多数穷人都有工作,但他们的劳动并不能使他们的收入高于贫困线。⁶⁴ 在全球范围内,估计有 3.27 亿工资劳动者(包括 1.52 亿妇女)的工资等于或低于适用的每小时最低工资,占有工资劳动者的 19%。⁶⁵

⁵⁷ 教科文组织,“2020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第 232 页(见脚注 37)。

⁵⁸ James J. Heckman 和 Stefano Mosso,“The Econ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第 19925 号(国家经济研究局,2014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第 8 页。

⁵⁹ Meredith Phillips,“Parenting, time use, and disparities in academic outcomes”,in Duncan and Murnane, eds., *Whither Opportunity?*(见脚注 33),第 217 页及第 221 页。

⁶⁰ Heckman 和 Mosso, *The Econ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 (见脚注 58)。

⁶¹ 世界银行,“公平进展?”,第 144 页(见脚注 2)。

⁶² Heckman 和 Mosso, *The Econ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 第 3 页(见脚注 58)。

⁶³ James J. Heckman,“Schools, Skills, and Synapses”,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第 14064 号(国家经济研究局,2008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第 12 页。

⁶⁴ A/60/314, 第 9 段。

⁶⁵ 国际劳工组织,《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告:COVID-19 时代的工资和最低工资》(2020 年,日内瓦),第 16-17 页。

30. 即使领取最低工资，低收入者也可能因被迫接受非正规就业和克扣工资或拖欠工资而陷入不稳定的境地。为编写本报告咨询了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贫困人口，他们分享了未全部支付工资、意外收费和在与雇主的关系中被欺骗的经历，证实了这一问题的存在。低收入劳动者也可能担心成立工会会导致失业。这导致成立工会的比率降低，进而导致工资停滞和工作条件恶化。

31. 其次，即使在非正规就业率相对较低的国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壁垒也会阻碍贫困人口获得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关系对获得就业的重要性：朋友、家人或其他熟人在帮助发现和抓住机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⁶⁶ 在美国，10个职位空缺中有7个不会在公共招聘网站上发布；每10个工作中就有8个是通过职业关系网和人际关系来填补空缺的。⁶⁷ 在法国，2020年有41%的职位空缺是通过“隐性就业市场”填补的。⁶⁸

32. 第三，“愿望之窗”可能起到一定作用：对于面临社会经济劣势的儿童来说，没有贫困负担的生活可能很难想象。⁶⁹ 在父母属于管理阶层的儿童中，一半人自己成为经理人，但体力劳动者的子女有机会成为经理人的不到四分之一。在美国和德国，富有父亲的孩子中几乎一半人自己都处于收入最高的25%。⁷⁰ 在加拿大，如果父亲属于收入最高的1%的人，他们的孩子中几乎10人中有7人在自己父亲曾效力的雇主那里找到工作；在丹麦，如果父亲属于收入最高的1%的人，他们的孩子中的这一比例也有略高于一半。⁷¹

33. 这些数字表明，贫困固化的原因不只是收入贫困，甚至也不是通常(尽管不一定)与低收入有关的不利因素，如难以获得医疗保健、营养、住房或教育。不平等本身就是一个促成因素。

三. 不平等和贫困固化

34.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认，持续、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实现财富分享和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规定减少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10)，并承诺确保赚取收入者中最低层40%的人在收入增长

⁶⁶ Linda Datcher Lounsbury, “Some contact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informal networks, job tenure, and wages”, 《劳动经济学杂志》，第24卷，第2期(2006年2月)，第299-318页。

⁶⁷ Wendy Kaufman, “A Successful Job Search: It’s All About Networking”,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2011年2月3日。可查阅：<https://www.npr.org/2011/02/08/133474431/a-successful-job-search-its-all-about-networking>。另见 Mark Granovetter,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第二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5年)。

⁶⁸ Randstad, “Étude Randstad SmartData sur le marché de l’emploi”, 2021年2月17日。

⁶⁹ Arjun Appadurai, “The capacity to aspire: culture and the terms of recognition”, 见于 Vijayendra Rao 和 Michael Walton 编著的“Culture and Public Action”(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2年)。

⁷⁰ 经合组织，“断裂的社会阶层上升通道”，第186页和第15页(见脚注1)。

⁷¹ Miles Corak 和 Patrizio Piraino,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mployers”, 《劳动经济学杂志》，第29卷，第1期(2011年)，第37-68页。

速度上要高于平均水平。⁷² 减少不平等和财富重新分配非但不会阻碍增长，还会促进增长和减贫，⁷³ 同时缓解把增长作为减贫手段与不可超出地球承受能力这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增长成果在全社会的再分配越公平，减少贫困所需的成长量就越低。⁷⁴ 更平等的社会也能更好地应对与医疗卫生、教育和暴力相关的一系列挑战。⁷⁵

35. 然而，自 1980 年代以来，收入集中于全球收入分配顶层的情况加剧，压低了底层的收入份额。自 1980 年以来，全球一半的收入落入顶层 10% 人口的手中。事实上，在收入最高的 1% 人口中，收入份额继续增加，从 1980 年的 16% 上升到 2000 年的 22%，而全球最底层 50% 人口的份额保持在 9% 左右。⁷⁶ 收入增长的速度也不均衡：在四分之三的经合组织国家中，收入最高的 10% 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高于最贫穷的 10% 家庭。⁷⁷

36. 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在特定国家也存在。在亚洲国家，收入最高的 10% 人口的收入份额略有下降，但仅从 57.5% 降至 50.6%，在欧洲，这一比例从 30.7% 升至 35.9%。⁷⁸ 在俄罗斯联邦，2019 年收入最高的 1% 人口的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 20%，是收入最低的 50% 人口的 50 倍。⁷⁹ 在中国，收入最高的 1% 人口在 1990 年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8%，2019 年这一比例升至 14%，而在印度，1990 年和 2019 年的相应数字分别为 11% 和 21%。⁸⁰ 在拉丁美洲和中东这两个世界上最不平等

⁷² 第 70/1 号决议，第 27 段。

⁷³ François Bourguignon, “Spreading the wealth”, 《金融与发展》，第 55 卷，第 1 期(2018 年 3 月)；另见经合组织，“同舟共济”，第 69 页(见脚注 44)。Era Dabla-Norris 等人，“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讨论要点 15/13(2015 年 6 月)，第 8 段(结论是，收入底层的 20% 人口的收入份额每增加 1%，国内生产总值会增长 0.38%，而收入顶层的 20% 人口的收入份额每增加 1%，国内生产总值会下降 0.08%)。

⁷⁴ A/75/181。

⁷⁵ Richard G. Wilkinson 和 Kate E. Pickett, “The enemy between us: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osts of inequality”，《欧洲社会心理学期刊》，第 47 卷，第 1 期(2017 年 2 月)，第 11-24 页。

⁷⁶ 世界不平等数据库，20 岁以上人口的税前收入估计。可查阅：https://wid.world/share/#/countriestimeseries/sptinc_p90p100_z/WO;QB;QD;XL;QE/last/eu/k/p/yearly/s/false/28.9715/70/curve/false/country。

⁷⁷ Federico Cingano, “Trends in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经合组织社会、就业和移民工作文件，第 163(2014)号，第 7 段。

⁷⁸ 世界不平等数据库(见脚注 76)。

⁷⁹ Theresa Neef, “What’s new about income inequality in Russia (1980-2019)? Trends in comparison to Eastern Europe”，世界不平等实验室，《问题简报》，2020 年第 5 号(2020 年 11 月)。

⁸⁰ Li Yang, “What’s new about income inequality data in Asia?”，世界不平等实验室，《问题简报》，2020 年第 8 号(2020 年 11 月)。

的区域，收入分配中收入最高的 10% 人口的收入分别占平均国民收入的 54% 和 56%，⁸¹ 非洲的不平等程度相似，收入最高的 10% 人口获得国民收入的一半。⁸²

37. 财富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严重，并且增长速度更快。在经合组织各国中，财富不平等的水平平均是收入不平等的两倍：最富有的 10% 人口拥有总净财富的 52%，而收入最高的 10% 人口拥有总收入的 24%。反之，财富分配中最底层的 60% 在总财富中的占比略高于 12%。在经合组织国家，在收入高于贫困线的人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缺乏必要的财力来应对突然失去收入的情况，例如在失业、家庭破裂或生病的情况下。⁸³ 在美国，2019 年，有孩子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是净资产贫困家庭(他们的资产减去总债务低于联邦贫困线)，是收入贫困家庭的三倍。⁸⁴ 事实上，自 1970 年以来，大多数富裕国家的私有净财富普遍增长——从 1970 年的 200%-350% 增至 2018 年的 400%-700%，这种增长基本上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反，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国家的净公共财富都在下降。⁸⁵

38. “精英制度”是一种过时、如今被认为是错误的认知，而不平等不仅助长了这种认知，而且成为这种认知的佐证。经济上的成功有时仍被视为一个人努力和能力的反映，这一观念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特别普遍，⁸⁶ 并且也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这种观念在高收入者在尤其普遍。⁸⁷ 因此，不平等的加剧导致那些收入较高的人认为，穷人的“资质”较低，并且穷人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是理所应当的，从而以资质不同为由证明不平等是正当合理的。⁸⁸ 反过来，这又导致个人的缺点被认为是贫困的主要原因：要贫困者对贫困负责。⁸⁹ “精英制度”既减少了对受

⁸¹ Rowaida Moshrif,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Middle East”,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问题简报》, 2020 年第 6 号(2020 年 11 月)。

⁸² Anne-Sophie Robilliard, “What’s new about income inequality data in Africa?”,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问题简报》, 2020 年第 3 号(2020 年 11 月)。

⁸³ Carlotta Balestra 和 Richard Tonkin, “Inequalities in household wealth across OECD countries”, 经合组织统计工作文件(2018 年 6 月), 第 4 和 7 页。

⁸⁴ Christina Gibson-Davis, Lisa A. Keister 和 Lisa A. Gennetian, “Net worth poverty in child households by race and ethnicity, 1989-2019”, 《婚姻与家庭杂志》, 第 83 卷, 第 3 期(2021 年 6 月), 第 667-682 页。

⁸⁵ Facundo Alvaredo 等人, 《2018 年世界不平等报告》(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2018 年), 第 15 页。

⁸⁶ Jonathan J. B. Mijis, “The paradox of inequality: income inequality and belief in meritocracy go hand in hand”, 《社会经济评论》, 第 19 卷, 第 1 期(2021 年 1 月), 第 7-35 页。

⁸⁷ Karlijn L.A. Roex, Tim Huijts 和 Inge Sieben: “Attitudes towards income inequality: ‘Winners’ versus ‘losers’ of the perceived meritocracy”, 《社会学学报》, 第 62 卷, 第 1 期(2019 年 2 月), 第 47-63 页。

⁸⁸ Nicholas Heiserman 和 Brent Simpson, “Higher inequality increases the gap in the perceived merit of the rich and poor”, 《社会心理学季刊》, 第 80 卷, 第 3 期(2017 年 9 月), 第 243-253 页。

⁸⁹ Robert Walker, “The Shame of Poverty”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牛津), 第 132-156 页。

影响群体的同理心，也让不平等看起来像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可取的现象——一种激励人们取得更多成就的手段。⁹⁰

39. 然而，贫困并不是懒惰、缺乏自制力或规划不足的结果：其根源在于高失业率、工资停滞和歧视等结构性因素。⁹¹ 不平等不是激励人们取得成就的因素；相反，它降低了社会流动性，⁹² 部分原因是，不平等使贫困人口难以投资于人力资本，另外一个原因是，人生中的成功取决于是否拥有获得资源的途径，无论是货币资源还是非货币资源，而富裕的社会阶层更容易借力这些资源。

40. 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往往是经济优势和劣势都传递给儿童的国家——这种关系通常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例如，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父母经济地位与子女成年后收入之间的联系在丹麦、芬兰和挪威表现得最弱，在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表现得最强(在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地位处于顶层和低层十分之一的家庭中长大的儿童更可能拥有与其父母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这种关系在低收入国家更强。⁹³ 在非洲，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国家(例如加纳和乌干达)的教育和职业流动性要比不平等程度较高国家(例如科特迪瓦、几内亚和马达加斯加)更大。⁹⁴ 即使以人类发展不平等而不是仅以收入不平等作为衡量标准，不平等和社会等级化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成立的。⁹⁵

41. 与收入不平等一样，财富不平等是导致贫困固化的一个主要因素：⁹⁶ 一项跨国比较显示，在解释产生代际流动性差异的原因方面，父母的财富所起的作用大于收入，对孩子的人生机会有很大影响。⁹⁷ 事实上，一个人能够调动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他们抓住机遇的能力。获得财富增加了投资教育、参与利润丰厚的家族企业和投资新的(包括高风险)企业的可能性；和收入一样，财富不仅可以通过使孩子更多地接触书籍、获得家教和进入私立学校，以金钱换取教育成就，而且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使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够专注于高等教育的学业挑

⁹⁰ Hannah B. Waldfogel 等人，“Ideology selectively shapes attention to inequality”，《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第 118 卷，第 14 期(2021 年 4 月)。

⁹¹ Paul K. Piff 等人，“Shifting attributions for poverty motivates opposition to inequality and enhances egalitarianism”，《自然人类行为》，第 4 卷，第 5 期(2020 年 5 月)，第 496-505 页。

⁹² 经合组织，“同舟共济”，第 27 页(见脚注 44)。

⁹³ Corak，“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第 81-82 页(见脚注 36)。

⁹⁴ Thomas Bossuoy 和 Denis Cogneau，“Social mobility in five African countries”，《收入与财富评论》，第 59 卷，第 S1 期(2013 年 10 月)，第 s84-s110 页。

⁹⁵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9 年人类发展报告 (2019 年，纽约)，第 74 页。

⁹⁶ Juan C. Palomino, Gustavo A. Marrero 和 Juan Gabriel Rodríguez，“One size doesn't fit all: a quantile analy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S. (1980-2010)”，《经济不平等杂志》，第 16 卷，第 3 期(2018 年 9 月)，第 347-367 页。

⁹⁷ Timothy M. Smeeding, Robert Erikson 和 Markus Jäntti 编著，《Persistence, Privilege, and Parenting》(罗素塞奇基金会，2011 年，纽约)，第 123 页。

战，而不是经济挑战。⁹⁸ 此外，最富有的人更容易利用税收制度中的漏洞来减少纳税负担，或者逃税；这些人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来增加政治影响力，导致联合国和发展会议所称的“食利资本主义”现象，即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行为者攫取国家权力，以进一步增强其主导地位。⁹⁹

42. 继承和赠与等代际财富转移的流动在解释财富集中对原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¹⁰⁰ 在欧洲和美国，继承财富的比例从 1950 至 1980 年期间的 30% 至 40% 增长至 2010 年以来的 50% 至 60%。¹⁰¹ 获得遗产或赠与的可能性随着财富等级的上升而加大：在德国和美国，最富有的 1% 家庭获得的转移财富占转移总额的 18%，而最贫穷的 25% 家庭获得的份额非常低。¹⁰² 在经合组织各国中，净财富最高的 20% 家庭所收到的遗产和赠与的价值平均占有所有家庭平均净财富的 72%，而净财富最低的 20% 家庭收到的遗产和赠与的价值不到平均净财富的 1.5%。¹⁰³

四. 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

A. 对幼儿时期的投资

43. 出身贫困的儿童被剥夺了获得平等机会的权利，而高度不平等又导致社会流动趋低。然而，这些儿童并不是注定要失败的。生活贫困的家庭所经历的压力可能通过各种生理机制对儿童产生长期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可以通过支持性的育儿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此外，出生在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可以发展能力和获得技能，而这些能力和技能可使之能够在日后的生活中应对不利情况，这种经验知识值得更好地认识和重视。¹⁰⁴

44. 在幼儿时期向家庭提供的支持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儿童贫困。这种支持增加了儿童成年后改善生计的机会，从而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例如，孕产妇福利会增加陪伴孩子的时间，进而导致高中辍学率下降 2%，30 岁时工资增加

⁹⁸ Breno Braga 等人，“Wealth inequality is a barrier to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城市研究所（2017 年 4 月）。

⁹⁹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7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紧缩之后：走向全球新政”（2017 年，纽约和日内瓦），第 139 页。

¹⁰⁰ Laura Feiveson 和 John Sabelhaus，“How does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transmission affect wealth concentration”，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2018 年 6 月 1 日）。

¹⁰¹ Facundo Alvaredo, Bertrand Garbinti 和 Thomas Piketty, “On the share of inheritance in aggregate wealt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00-2010”，《经济学》，第 84 卷，第 334 期（2017 年 4 月），第 239-260 页，第 239 页。

¹⁰² Brian Nolan 等人，“The Wealth of Famili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Wealth in Brit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纳菲尔德基金会报告》（2020 年），第 51 页。

¹⁰³ 经合组织，“断裂的社会阶层上升通道”，第 206 页（见脚注 1）。

¹⁰⁴ Rachel Bray 等人，《The Hidden Dimensions of Poverty》（第四世界出版社，2019 年，蒙特勒伊）。

5%。¹⁰⁵ 普遍儿童福利在这方面证明是有效的，特别是因为普遍福利降低了针对性救济可能带来的包容不足和污名化风险。¹⁰⁶ 平权方案，包括通过将低收入家庭转移到更富裕的地区来取消社区隔离(同时注意不要扰乱现有的支持网络或确保建立新的此类网络)，¹⁰⁷ 或者鼓励儿童接受高等教育，¹⁰⁸ 也可有助于阻止因在贫困社区长大的儿童在以后的人生中依然居住在类似社区而使劣势代代相传的模式。虽然贫困可能会使儿童无法获得平等的人生机会，但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进行干预可以让处境不利的儿童克服贫困的影响。

45. 在幼儿时期进行干预最有可能发挥效力。然而，此类干预面临两大障碍。首先，即使在有支持低收入家庭的公共方案的情况下，这类家庭，特别是那些单亲父母为一家之主的家庭，可能对这些方案知之甚少，或者无法申领在理论上可以获得的支持。¹⁰⁹ 家访为准父母和有幼童的家庭提供信息、资源和支持，可以是克服障碍和降低不获取福利比率的重要工具。¹¹⁰ 家访计划在短期是昂贵的，但在中期和长期的积极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改善儿童的就业前景，以及减少家庭对公共援助计划的需要。¹¹¹

46. 其次，正如在编写本报告时进行的对话中所强调的那样，处于劣势的家庭往往对社会服务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从而阻碍了这些服务提供有效支持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这些服务机构充当把关人，以防止家庭滥用社会保障系统，防止欺诈。另一个原因是，将儿童从家庭中带走只应是最后手段，¹¹² 诚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所说，“经济原因不能成为儿童与父母分

¹⁰⁵ Pedro Carneiro, Katrine V. Løken 和 Kjell G. Salvanes, “A flying start? Maternity leave benefits and long-run outcomes of children”, 《政治经济学期刊》, 第 123 卷, 第 2 期(2015 年 4 月), 第 365-412 页。

¹⁰⁶ 国际救助儿童会, 普遍儿童福利: 终止儿童贫困的基础(2020 年 7 月)。

¹⁰⁷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和 Lawrence F. Katz, “The effect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and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美国经济评论》, 第 106 卷, 第 4 期(2016 年 4 月), 第 855-902 页。

¹⁰⁸ Elise de Vuijst, Maarten van Ham 和 Reinout Kleinhan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esiding in poverty neighbourhoods”, 《环境与规划 A: 经济与空间》, 第 49 卷, 第 9 期(2017 年 9 月), 第 2135-2154 页。

¹⁰⁹ 特别报告员计划编写一份关于不行使获取福利权利的世界性调查, 以评估这一挑战的原因并找出解决办法。

¹¹⁰ Anne Duggan 等人, “Implementation of Evidence-Based Early Childhood Home Visiting: Results from the Mother and Infant Home Visiting Program Evaluation”(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规划、研究和评估办公室, 2018 年, 华盛顿特区)。

¹¹¹ Charles Michalopoulos 等人, “Evidence on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Home Visiting Programs: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Long-Term Follow-Up in the Mother and Infant Home Visiting Program Evaluation (MIHOPE)”(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规划、研究和评估办公室, 2017 年, 华盛顿特区)。

¹¹² 《儿童权利公约》第 9 条规定, 儿童有权不与亲生父母分离, 除非这种分离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

离的理由”，¹¹³ 但是，生活贫困的儿童特别有可能与家人分离。¹¹⁴ 当机构为了确保儿童获得食物、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所而积极鼓励父母将自己的孩子交由机构照料时，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了。¹¹⁵

47. 改善幼儿保育和教育以及支持处于劣势的家庭对于打破贫困循环至关重要。社会服务机构的作用不应是创造新的依赖形式，¹¹⁶ 而应是与父母结成伙伴关系，重点放在儿童的最大利益上，并通过帮助、父母培训和监督，提高家庭的自主性。在存在侵害、忽视、暴力或虐待风险的情况下，社会服务机构应设法提出可以让儿童继续与家人和社群生活在一起的居家措施，而不是将他们分开，并安置儿童寄宿或交给家庭寄养。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可负担的高质量日托对于确保处于劣势的儿童更好的准备就学也是至关重要的。

B. 全纳教育

48. 学校本身往往不能完全弥补处境不利和处境较差的儿童之间在学前教育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在贫富之间的居住隔离成为一个重要因素的情况下。比学校可用的资源或教室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同龄人的影响、教师的士气和资历以及学校对学业准备的重视。¹¹⁷

49.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消除隔离、包容的教育体系，而且这一教育体系积极致力于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儿童提供平等机会。真正包容的学校是这样的：在课余时间提供更多课外活动机会；¹¹⁸ 加强学校和社区之间的联系，以增加儿童的社会资本及其接触各种网络的机会；减少以学习成绩为依据挑选和评估儿童所起的作用，代之以珍视每个儿童在课堂上的贡献；确保学习方向不会对低收入儿童不公正，应充分尊重他们的选择和愿望，而不是因为常见的偏见(即认为这些

¹¹³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儿童将其最大利益列为首要考虑的权力的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2013)(第 3 条，第 1 款)，(CRC/C/GC/14, 2013)，第 61 段。

¹¹⁴ 例如，见 Olga Borzova, “Social services in Europe: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removal of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 in Council of Europe member States”,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报告，第 13730 号文件(2015 年 3 月)，第 10 页；Samantha Chaitkin 等人, “Towards the Right Care for Children. Orientations for Reforming Alternative Care Systems. Africa, Asia, Latin America” (欧盟委员会和国际 SOS 儿童村，2017 年)，第 12 页。

¹¹⁵ Joanne Doyle, “Misguided Kindness”.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s for Children in Emergencie” (英国救助儿童会，2010 年，伦敦)，第 5 页。

¹¹⁶ 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向成员国提出的关于儿童权利和有利于儿童和家庭的社会服务的 CM/REC(2011)12 号建议(2011 年 11 月 16 日)。可查阅：<https://rm.coe.int/168046ccea>。

¹¹⁷ Robert D. Putnam,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2015 年，纽约)，第 4 章。

¹¹⁸ Greg J. Duncan 和 Richard J. Murnane, “Restoring Opportunity. The Crisis of Inequality and the Challenge for American Educa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教育出版社，纽约，罗素赛奇基金会，2014 年)。

儿童无法在某些被认为要求更高的学习课程中取得成功)而忽视或不理会其选择和愿望。¹¹⁹

50. 只要学校积极致力于确保机会平等,而不是简单地复制从童年起继承的已有不平等,学校可能会为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第二次机会。更加一体化的教育体系还会确保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形成更亲社会的行为,并且不太可能歧视贫困学生,而在 2007 年德里的各精英学校被责令为来自年收入约 2 000 美元以下家庭的学生保留 20%的名额后,对这些学校进行的一项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¹²⁰ 这大大提高了整体社会融合。

C. 为年轻成年人提供基本收入

51. 当这些儿童进入成年时,可以给他们第三次机会。在中学毕业到 25 岁之间提供普遍基本收入可能特别有益。对乌干达随机现金转账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年轻人(在没有救济的情况下通常无法获得信贷)将现金转账投资于职业技能和工具,导致现金收入大幅增加(与对照组相比几乎增加 50%):实际年资本回报率平均为 35%。¹²¹ 同样,在肯尼亚农村地区启动普遍基本收入计划的实验表明,即使一个数额相对较低、有保证、无条件的收入计划(相当于每天 0.75 美元)也能改善粮食安全、身心健康和创业精神——保护家庭在危机时期不必出售生产性资产,并鼓励家庭进行生产性投资。¹²² 对富裕国家的普遍基本收入计划的研究表明,此种计划要么对就业没有负面影响,要么只有轻微影响(无条件现金转账使收入增加 10%,而劳动力供应减少约 1%),但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收获显著改善,特别是在处境最不利的年轻人中。¹²³

52. 顾名思义,由于其普遍性,向年轻人提供普遍基本收入不会带来耻辱,而且避免了与经济情况调查方案中的针对性救济相关的风险。在大多数国家,这样的计划可以通过增加遗产税来筹集资金。这也将是解决财富不平等加剧的一种连贯一致的方式。在经合组织各国,最富有的家庭(顶层的 20%)报告的遗产和赠与比最贫穷的家庭(底层的 20%)报告的遗产和赠与高出近 50 倍,这表明,因为财富不平等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遗产继承在固化甚至加剧不平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 37 个经合组织国家中,只有 24 个国家对代际遗产、房地产或赠与征税,

¹¹⁹ 见 ATD Quart Monde, *Nos ambitions pour l'école* (见脚注 40)。

¹²⁰ Gautam Rao, "Familiarity does not breed contempt: generosity, discrimination and diversity in Delhi schools", 《美国经济评论》,第 109 卷,第 3 期(2019 年 3 月),第 774-809 页。

¹²¹ Christopher Blattman, Nathan Fiala 和 Sebastian Martinez, "Generating skilled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Uganda", 《经济学季刊》,第 129 卷,第 2 期(2014 年 5 月),第 697-752 页。

¹²² Rebecca Linke, "12-year study looks at effects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2018 年 1 月 30 日)。关于向随机选择的贫困家庭提供一笔总付款的评估,见 Johannes Haushofer 和 Jeremy Shapiro, "The short-term impact of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to the poor: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Kenya", 《经济学季刊》,第 131 卷,第 4 期(2016 年 11 月),第 1973-2042 页(显示资产持有量和收入增加,但对健康和教育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¹²³ Ioana Marinescu, "No Strings Attached: The Behavioral Effects of U.S.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 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第 24337 号(国家经济研究局,2018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

而且征收的税款通常非常低，平均只占 24 个相关国家总税收的 0.5%。当然，各国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在美国，只有 0.2% 的遗产需要缴纳遗产税，父母最多可以免税向子女转移 1 100 万美元，而比利时布鲁塞尔-首都地区的这一数字分别为 48% 和 1.7 万美元。¹²⁴ 然而，总的来说，在向年轻人提供普遍基本收入计划，使之能够继续接受教育或创办小企业的同时，对遗产税征税或提高遗产税的累进率，可能是打破贫穷循环的一种行政管理上易行、基本上无痛的方式。

D. 禁止基于社会经济劣势的歧视

53. 打破贫困循环的各项措施应以消除基于社会经济劣势的歧视这一总目标为基础。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2 款中，禁止歧视的理由包括“社会出身”和“财产”。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重申，“不应根据是否属于某一经济或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来武断对待”人们，¹²⁵ 并坚持认为这些理由应纳入《公约》缔约国通过的反歧视框架内。¹²⁶ 然而，对个人或群体基于社会经济劣势的歧视仍然普遍存在。

54. 为了适当评估禁止基于社会经济劣势的歧视对打破贫穷固化循环起到的促进作用，应从本质上看待处于劣势的个人和家庭所面临的歧视：这是一种影响到健康、教育、住房和就业等一系列领域的系统性歧视形式。

55. 因此，如果消除基于社会经济劣势的歧视工作如果仅限于一个领域，那是无法取得效果的。例如，如果处于劣势的个人在获得优质教育方面继续面临障碍，或者居住在远离工作地点的贫困社区，那么，确保雇主不以贫困为由进行歧视将产生有限的影响；如果居住隔离没有受到挑战，从而使这些学生继续集中在某些学校，那么，向处于劣势的学生比例较高的学校提供支持可能不会对这些学生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健康不平等持续存在，并因而降低劳动者的生产率和学业成就，那么，仅消除就业或教育方面的歧视是不够的。

56. 尽管消除对贫困者的偏见(被称为“厌贫症”、“贫困歧视主义”或简称“阶级论”)的通常解决办法是某种形式的精英制度，但如果处于劣势的个人在获得某些资格或使其经验能力得到正式承认方面没有公平机会，这是不适当的。还需要开展其他的工作，而反歧视法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57. 要求保障处于劣势的群体和个人获得平等待遇会产生三种潜在影响。¹²⁷

¹²⁴ 经合组织，“经合组织国家的遗产税”(2021 年，巴黎)。

¹²⁵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不歧视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2 款)(E/C.12/GC/20 (2009 年 7 月 2 日))，第 35 段。

¹²⁶ 例如，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加拿大第六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E/C.12/CAN/CO/6 (2016 年 3 月 23 日))，第 17 段(将“社会条件”称为被禁止的歧视理由)。

¹²⁷ 特别报告员在另一份报告中探讨了反歧视法对消除贫困的贡献。

58. 首先，除了基于社会经济劣势的直接歧视之外，如果基于表面上中立的理由作出的决定会对贫困者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则还应禁止间接歧视为。¹²⁸ 不应允许雇主因求职者居住的地点(贫困社区)或求职者就读学校的声誉(来自处于劣势背景的学生就读的比例过高)拒绝接受求职者。不应允许房东拒绝将公寓租给依赖社会救济的租户。不应允许学校惩罚无法购买教材或无法使用互联网的学生。最后，不应允许公共实体在没有考虑对贫困者的影响并确保其决定不会加剧不平等的情况下作出政策决定或决定实施监管改革。例如，在联合王国，《增强苏格兰平等责任条例》规定，苏格兰的公共机构有法律责任在作出战略决策时，“适当考虑”公共机构如何减少因社会经济劣势造成的结果不平等。¹²⁹ 在南非，一家西开普省平等法院认为，与较富裕的白人社区相比，南非警察部门分配给以黑人为主的贫困社区的资源有很大差异，这简直就是基于种族和贫困的歧视，后者是一个可作为提出歧视申诉所依据的“类似”和“未列入的”理由，因为这“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平等享有产生不利影响，其严重程度可与基于所列原因的歧视相提并论”。¹³⁰

59. 第二，社会经济上处于劣势的个人应该有权获得“合理的通融”，这特别意味着应该考虑到他们的个人情况，并且他们基于从实践经验中获得的资格所能作出的特殊贡献应该得到承认和重视，即使这些贡献是非典型的。自 2015 年以来，正是这一理念促使一些法国市政当局启动了“零长期失业区”实验，其所依据的理念是，长期失业的人拥有可以有益于社会的才能，前提是这些才能得到有效认可并为这些人创造机会。

60. 第三，为了解决基于贫困的歧视的系统性，并摆脱对“资质”的传统认知的盲目迷恋，应考虑采取平权行动方案，以支持处于劣势的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和进入他们代表性不足的就业部门。这也有助于克服造成贫困固化的因素中有限的“愿望之窗”和缺乏社会网络的问题。平权行动不应被视为结构性措施的替代，这些结构性措施的例子包括投资于贫困社区的经适房、增加对学校或就业政策的资助，但平权行动可有助于在那些按财富多寡长期隔离的社会消除隔离状况。

¹²⁸ 在爱尔兰，目前尚待通过的《2021 年平等(杂项规定)法案》将具有社会经济劣势定义为“社会或地理上可识别的群体的成员，该群体因下列一种或多种情况而处于劣势：(a) 贫困状况，(b) 收入来源，(c) 文盲，(d) 教育程度，(e) 地址、住房类型或无家可归状态，(f) 就业状况，(g) 社会或地方口音，或任何其他类似情况”(可查阅：<https://data.oireachtas.ie/ie/oireachtas/bill/2021/6/eng/initiated/b0621d.pdf>)。在南非，《促进平等和防止不公平歧视法》(执行《宪法》第 9 节的规定)载有一项指导原则，要求特别考虑将社会经济地位等原因列入禁止理由清单：这一表述被定义为“因贫困、就业状况不佳或没有学历或学历低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社会或经济状况或被认定的状况”。

¹²⁹ 见 2010 年《平等法》(当局须承担“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的责任”)(苏格兰)2018 年条例。可查阅：<https://www.legislation.gov.uk/sdsi/2018/9780111038086/body>。

¹³⁰ 西开普省高等法院，社会正义联盟等诉警察局局长等人，案件编号 EC03/2016，已核准的判决，2018 年 12 月 14 日，第 65 段。

五. 结论

61. 通过投资于幼儿教育和保育，通过确保学校真正具有包容性，通过提供基本收入保障支持年轻人，可以打破导致贫困固化的循环。重申禁止基于社会经济劣势的歧视并加以贯彻落实，将使法院和国家人权机构能够为这一努力作出贡献。这不只是符合贫困者的利益，也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因为社会无法承受才能的浪费，也无法承受不平等加剧导致的社会结构崩塌。
